

后真相时代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谣言的心理学分析

李明怡，屈雪花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谣言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形态和传播机制不同，在情绪化的“后真相”时代，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谣言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形态，在符合谣言传播公式的同时呈现出非虚构叙事和“科学”分享等特征。本文基于“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2022年3月至5月的谣言事件，拟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新冠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试图分析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

关键词：后真相；谣言；心理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正文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杂志中，史蒂夫·特希奇描述其含义为：在情感的煽动下舆论代替了客观真相^[1]。2016年，《牛津词典》定义“后真相”的内涵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即受众的情感、情绪对事件真相的认知和判断产生影响，倾向于表达对事件的情绪化立场和观点，使其对事件的真实认知有较大的偏颇。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以及疫情带来的恐慌与不安，让个人情绪极大的影响了真相的自发传播。而社交网络平台放大了媒介赋予公众的话语权，隔离在家的公众把网络空间作为情绪宣泄口去传播信息甚至创造信息。公众一边用情绪揣摩真相，一边被带有情绪的舆论影响，让自己迷失在“后真相”中。这种情感先行带来的非理性思考、情感偏好铸造的信息茧房、情感催生的虚假事实满足公众想象为谣言的滋生与扩散提供了温床，甚至带来了一场谣言危机^[2]。

谣言的产生和发展与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心理相关。“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4]，从“口口相传”到“文字时代”，再到大众媒介时代，谣言“经久不衰”，它总是以各种形式和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了普通人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与途径。不同于古代信息传播的迟钝和神秘，互联网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网络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作用凸显，使得谣言的证伪变得更加透明、方便，但是后真相时代下的公众常常被情绪煽动、真相被谣言取代，谣言裂变的速度和路径也更为复杂，加大了管制部门对谣言治理和预防的难度。

在新冠疫情后，学界也展开了对“新冠疫情中谣言的传播反思”，讨论相关报道的话语、传播、谣言治理等，由此，这场危机背后的“信息疫情”产生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

本文以“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2022年3月—5月期间选取相关的谣言作为数据来源，探究其表现形式和特征；并借助传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谣言传播和社会心态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认识并解读新冠疫情中的谣言传播。

一、疫情时期谣言类型

当公众普遍以网络为主要渠道获取信息的情况下，防范网络谣言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公众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获取主流媒体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也在网络社交平台交流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些人抓住公众情绪非理性的特点，曲解、讹传疫情信息，使之演变成疫情谣言，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威胁着社会稳定。所以，本文对“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中近三个月的疫情相关谣言进行分类分析（表1），发现疫情期间谣言主要分为三类：伪政策类谣言、抹黑类谣言和阴谋论谣言，这些谣言涉及的主要内容大多是疫情防控和防疫发展。

表1 “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2022年3月—5月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类型情况

谣言类型	数量	百分比	涉及内容
伪政策类谣言	319	83.29%	疫情防控、疫情发展、疫情防护、治疗、复工复产、病毒危害性
抹黑类谣言	60	15.67%	感染者行为、疫情防控、防护工作人员
阴谋论谣言	3	0.78%	病毒传播
其他	1	0.26%	/
合计	380	100.00%	/

（一）伪政策类谣言

此类谣言模糊信息来源，通常披着“政策”的外衣，人们难以辨真假。随着近日多地出现零星病例，疫情防控政策谣言也传播开来。5月25日，多名网友在微博、抖音平台发布“南开区要封区可能是真的，已经通知了，封闭三天”的信息，引发部分网民的质疑与担忧，造成不良影响。天津防控小组也立即在网络平台辟谣了这条信息，并坦言正值天津市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不恐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关注官方权威发布。

（二）抹黑类谣言

这类谣言的传播者为了博眼球，抓住了网民情绪宣泄的心理，编造事实，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在工作中发现：有一条“‘阳性’患者隔离期限未

就回到园区”的视频在辖区多个微信群中转发，引起部分居民恐慌。苏家屯分局立即组织开展核查，经工作查明此信息为虚假信息，视频发布者是为了能够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增加点击量、吸引网民关注，随意用手机拍摄视频发布不实言论。

（三）阴谋论谣言

这类谣言多是恶意截取图片和视频，以阴谋论揣测疫情发生的原因，煽动民众情绪。4月上旬，有人在朋友圈恶意传播“有卧底”在上海楼宇里“播毒”的信息，这其实是医护人员尽心尽责对环境采样的场景。对此，湖北卫健委里吗发布消息辟谣，原视频发布者也主动澄清。

二、疫情时期谣言传播特征

奥尔波特作为谣言心理学研究的鼻祖，认为谣言：“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偶然性的谈话”^[4]。这种定义与当时的战时背景相关，不同“情境”之下的谣言传播也具有共性和异质的解释，一层表现为不同社会个体具有的共同社会心理，另一层则表现为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心理，这两层表现建构了后真相时代下疫情期间的谣言传播群像特征。

（一）贴切谣言空间传播公式

奥尔波特提出谣言传播基本法则： $R \approx I \times A$ ，即谣言传播的广度由其重要性与该主题的含糊性之积决定，本次“信息疫情”符合谣言空间传播的基本公式。首先，从表现主题来看，网上谣言基本为疫情感染案例和防疫措施，其指涉目标的叙事要素（对象、时间、地点）都趋于明确，给人“真实”的信息感知。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下，社会个人对周边事物且与自身利益尤其是生命密切相关时，谣言的显著程度被置于最高位置，对于查证和试错两者的比较，大众更趋向于信任，从而趋利避害。其次就是模糊谣言的来源。就搜集的谣言文本而言，信息叙事人称上表述尤为模糊，大都以“政府部门”、“公司”、“家庭”、“城市”等第三人称表述来含糊其辞，信息来源方面号称是事实却没有提供可以佐证的依据，以此模糊谣言发言人角色，做到真假难辨。最后，以多种手段赋予信息“真实性”意义，吸引到更多的受众，并在短时间内裂变。

（二）非虚构性叙事的同化作用

谣言采用虚构性叙事的方式突出同化作用。我们总是在理智与情感的相互渗透之间去对待谣言，我们对于谣言的认同便是情感的同化。疫情期间的谣言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手法，以现实背景为题材进行二次创作，丰富谣言的故事性、情节性引人入胜。这种叙事方式拉近了受众对于缺乏的信息感知，从情感和生活的角度被同化，选择相信这一次信息的传递。日常

生活谣言无处不在，重大突发社会危机事件面前更是如此，谣言不仅成为了人们谈笑间的话题更是从态度、认知、行为上对大众产生同化作用。

（三）“科学”外衣下的新知分享

这场信息疫情中的谣言散布者以刻意“科学”的状态冷静传播谣言。谣言传播者通常在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时滋生情绪化的谣言，试图煽动社会大众，带来负面影响。这次却以另一种“理智”、“科学”话语方式传播谣言，比如借助部分真实事件引起共鸣、或是借助钟南山等医学专家之名，从虚假行动轨迹中散布所谓“科学”、“权威”言论，从而避免大众对信息求证的环节。亦或是借助短视频、图文等手段躲避检查人员，进行最大程度上的传播。

三、疫情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回顾历史，荒诞而又影响深刻的谣言一直存在。从《叫魂》中，“百姓认为对魂的召唤有唤入和唤出两种。”^[5]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6]再至今日新冠期间的“信息疫情”，谣言仍然富有生命力。谎言历经不同时代，从神话到“陋俗”、从口口相传到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信息查证变得越发简单，但是谣言滋生的速度和数量却没减少。如此想要解读谣言，不仅要关注谣言的传播的空间特征，更要注重社会性心理，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一）宣泄情绪和表达愿望：社会恐惧

大范围的社会恐惧会迫使民众寻求情绪宣泄和表达愿望的口径，这是谣言产生的主观心理因素。奥尔波特在其著作中提到：“它似乎能不可思议地缓解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焦虑^[4]。”疫情突发，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都弥漫着紧张和危险的气息，人们心中压抑着、不安着，谣言成为了情绪宣泄的绝佳方式。“空气传播”、疫情感染病例、“封城”出逃等谣言内容都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信息缺失的状态下，谣言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扩散，也是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公众借助此方式进行情绪的表达，个人认知与谣言内容结合，给本来就待验证的信息盖上模糊的面纱，让谣传变得可信。

（二）“个人记忆”到“集体意识”：群体压力

个人记忆与集体意识融合产生的群体性压力是新冠疫情中谣言产生的客观社会心理根源。奥尔波特与波兹曼从谣言心理学的角度对谣言传播的空间性展开了功能性的研究，直到荣格融合个人记忆与集体意识展开对谣言的历时性研究，进一步解释了谣言产生和传播中个人记忆与集体意识的社会继承性。

从勒莫的“幼虫—蛹—成虫”社会理论角度理解谣言背后的个人记忆与集体意识融合是相得益彰的。“幼虫”阶段正是个人记忆领域中封存和感受到的集体记忆。“往日社会的事件在社会记忆中留下印记…并用不可缺少的文化‘水泥’将各种心理连结起来^[7]。”“叫魂”和“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谣言,是基于历史的“神话”和日常生活的经验产生的集体记忆背景,新冠疫情期间谣言产生之初对比的是非典。掀开那段封存的历史记忆,未曾经历过的人畏惧,经历过的人胆战心惊,谣言结合往日社会事件在公众心中留下的印记,进入到充满现实生活的冲突、危机与压力的“蛹阶段”。最后迈入“破裂”、“爆发”的“成虫阶段”,谣言就破茧而出并飞速流传。由此可见,个人记忆与集体意识的相互交织产生的群体压力是新冠疫情期间不可忽视的社会客观性心理因素。

(三) 信息过滤取向与标签化传播:媒介效应

媒介效应所带来的信息过滤取向和标签化传播是客观环境下主动选择谣言的结合。媒介的发展催生了媒介环境心理学,丘吉尔在一次发言中概括出前提假设“我们将高楼赋以形状,反过来,高楼也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媒介效应应运而生。一方面,信息过滤取向主要表现为受众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信息、谣言的一个主动筛选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作出了一个符合我们私生活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9],所以网民之所以接受并传播谣言,极有可能是因为该谣言符合他对当下情境的解释。另一方面,媒介效应也让谣言传播者更加注重标签化传播,以极为简单的手法将谣言内容标签化,流转于各大社交账号之中。

(四) 公共权力与公众二元对立:信任危机

公众与公共权力的“二元对立”产生的信息危机是谣言得以持续的动力机制。“信息意味着权力,谣言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潜在的获取权力的渠道,传播谣言有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权力”^[10]。在孔力飞《叫魂》一书中也表达“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即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5]。这种权力尤其是在古代的社会群体运动中相得益彰,当下也不乏谣言倒逼真相的案例。在疫情高速袭来的同时,对信息的渴求将大众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到了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构建出看似二元对立的关系。缺乏明确有效依据的信息高速生产和传播,连续性瓦解了当下阶段公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信任危机也由此产生。这种危机弥漫在未知中,模糊了大众与权威信源、陌生人之间、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模糊了大众对于信息空间和时间的理解,从而站在公共权力的对立面,却又渴望和依赖其有效依据,陷入矛盾的漩涡中。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后真相时代,从谣言心理学的角度对新冠疫情疫情期间的“信息疫情”分析不仅要结合以往的谣言功能性研究,也要引入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历时性因素,同时,谣言传播与此时的媒介环境、社会结构、话语权利等因素密切相关。只要社会生活一天在继续,谣言一天不会消失,我们能够做的便是从传受者的心理动机出发,并促进有效信息的公开透明、加强谣言管制和正确引导舆论。

参考文献

- [1]. 张华. “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 新闻大学, 2017(3): 30-32
- [2]. 崔英超.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情感表达与治理[J]. 青年记者, 2020(26): 6-7
- [3]. 卡普费雷. 谣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8
- [4]. 奥尔波特等著. 谣言心理学[M]. 刘水平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原著序 1
- [5]. 孔飞力.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M] 陈兼, 刘昶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12: 134, 53, 43
- [6]. 刘孟扬. 天津拳匪变乱记事 [M], 第 2 册. 北京: 神州光国社, 1951
- [7]. 勒莫. 黑寡妇: 谣言的示意和传播. (唐家龙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 1999 年))
- [8]. 彭柳, 陈红飞.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文本特征及治理——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所辟新冠疫情谣言为例[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183-192+208
- [9]. 杨慧琼. 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 论谣言研究之路径发展[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11): 65-80
- [10]. 郭小安.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206-210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Rumors of Sudden Public Crisis Events in Post-truth Era

Li Mingyi, Qu Xuehua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Rumor has different forms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In the emotional "post-truth" era, in the face of sudden public crisis events, rumor is different from the form in daily life.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fiction narration and "scientific" sharing while meeting the rumor propagation formula. Based on the rumor events of "China Internet Rumor Refuting Platform" from March to May 2022,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rumors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and attempt to analyze the social psychology behind the rumors

Keywords: Post-truth; Rumor; Psychological Analysis